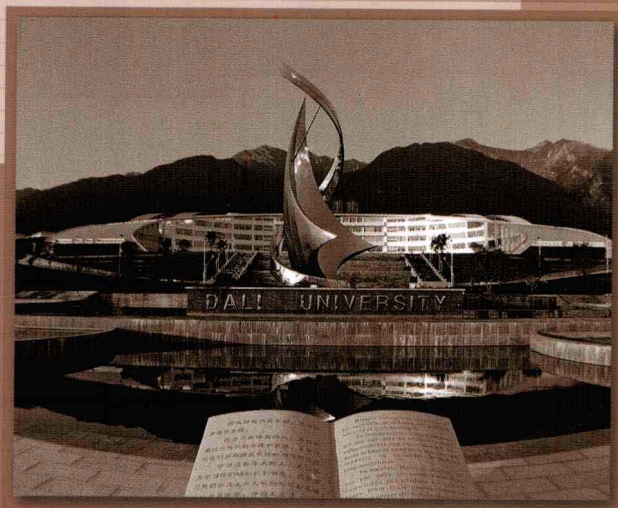


DALIXUEYUANWENXUEYUANRENWENWENCONGSHI

大理学院
文学院
人文丛书

三尺谭录

文学教研新视野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三尺谭录

——文学教研新视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尺谭录：文学教研新视野 / 《大理学院文学院人文丛书》
编委会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4

(大理学院文学院人文丛书)

ISBN 978-7-5367-3967-3

I.三… II.大… III.文学理论-教学研究-文集 IV.I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650 号

责任编辑	彭 华 奚寿鼎
装帧设计	一苇工作室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ynbook@vip.163.com
印 刷	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总 印 张	63
总 字 数	1608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000 套
总 定 价	110.00 元 (全套)
书 号	ISBN 978-7-5367-3967-3 / I · 801

编 委 名 单

总 顾 问：王 毅 戴志明
顾 问：董 鎰 王沛智 钱金枬 李 翔 洪世久
张 明 段利华 杨树元 赵 周 杨韶春
主 编：赵怀仁 纳张元
执 行 主 编：邓家鲜
副 主 编：赵 敏 张如梅 茅 维 杨红斌 邓家鲜
编 委：赵定甲 那茂菊 张锡禄 李守林 何永福
薛祖军 周锦国 赵淑琴 马永春 李丹丹
寸云激 倪强华 赵 霞 段利恒 谭 璐

《三尺谭录》序

大理院校长 李金明教授

文学院作为大理学院 16 个下属学院之一，在院系建设中，十分重视教学、教研和科研工作。面向 21 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把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素质的提高作为学院建设追求的目标。为了总结文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成果，编辑出版了《三尺谭录——文学教研新视野》一书。论文集收录了文学院 36 位教师的优秀论文 43 篇，是文学院教师教学科研成果的总结，也是各位教师在科研和教研上的收获。

该论文集分为“文化现象与解读”、“民族文化与研究”、“作品分析与批评”、“教学改革与实践”、“理论探索与争鸣”五个板块，虽然这种划分和编辑方式不一定很科学，但编者的出发点或许对本书的参考阅读来说会更实用一些。

论文集的“文化现象与解读”板块中收录了 5 篇论文。其中，纳张元教授的《冲突与消解——逼近世纪末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对阶段上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特点作了总结，体现出作者在文学评论上的深厚功底；而《生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吟——世纪末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一文，则站在现实和历史的高度，针对当前散文创作的现象，以世纪末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散文篇什作透视，考察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基本走向和特点，观点新颖，较有份量。其他几位年轻教师，如谭璐的《沈从文湘西小说与傩文化》，赖桂香、谭璐的《“本我”的狂欢——“80 后”文学的心理蕴含解读》；赖桂香、李蕙的《中国当代文学畅销书发展的现状及原因探析》等文，则用她们成熟的笔调，或从民俗学角度，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与傩文化的关系作探讨，或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对“80 后”少年作家的文学作品内部心理蕴含作了关照；或采取社会分析学的手法，对中国当代文学畅销书的状况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显露出她们新颖的观点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民族文化与研究”板块中收录了 12 篇文章。这是大理学院文学院教师在近几年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对白族文化方面研究成果的集合式的体现。大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使文学院的部分老师将民族民俗文化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何永福副教授的《九隆神话与图腾受孕机制》，从大量占有的历史文献典籍出发，对九隆神话的渊源、流变作了严谨的考证，并挖掘其图腾受

孕现象、图腾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文化内涵，是一篇资料详实、分析透彻、观点新颖的论文。薛祖军教授的《略论历史文化底蕴对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的影响》，则从喜洲白族的历史渊源和建筑审美理念入手，分析论述了白族民居形成的原因，揭示了白族民居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的重要意义，有较强的现实性。杜成辉博士的《大理国文学发展史述略》一文，对大理国时期的文学，尤其是石刻铭文作了考察，对当时的诗歌、骈文和散文等从其文学发展、成就、特点等作了综述，文章史料充分、观点新颖，显露出研究者的研究实力；《大理国诗人段福》则在收集各种史籍志书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对大理国功勋卓然的诗人段福事迹作了考证，显出研究者角度合理，论证谨严、有力的特点。朱安女硕士的《杜甫与南诏獠奴阿段》一文，通过杜甫在夔州与南诏獠奴阿段的情结，以中唐时期的杜甫看待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实例，透视了晚年杜甫“民胞物与”的特殊情怀；《“宋挥玉斧”之下的一个惨痛案例——大理国白氏碑与苏洵散文〈张益州画像记〉考释》一文，则从1972年出土的宋代大理国《故大师白氏碑铭并序》碑刻所记载出发，把其与苏洵的散文《张益州画像记》相互考释，证实苏洵歌颂张方平“凭遥安民”政策的背后原因在于大理国杀依智高并“函其首龟献”的宋朝真相，行文畅达；赵敏《大理“洋人街”的文化透视》则通过对大理“洋人街”的田野调查，结合白族地区商贸发展脉络中的相关史料和商贸传统，对白族街市进行文化人类学角度的透视，探讨了“洋人街”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民族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思考现代商业社会中的“人本关怀”命题。贾雪仙硕士的《诗意居住的哲思与履践——李元阳的诗文创作与大理文化》，则从李元阳的诗歌特点出发，盛赞了诗人李元阳的悲悯情怀和他天人合一的理想和实践，歌赞了大理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景致和内涵，文字活泼，激情洋溢。此外几位年轻教师张锡梅、饶峻姝、胡晓燕、李晋昆等，或从白族的崇拜文化探讨白族的民族精神，或从大理白族节庆民俗的特征出发，阐述其对白族节庆旅游的利用价值、开发的策略，或对南诏铁柱的立柱情况和相关传说的考释，论证其文化蕴涵；或从民俗学角度，探讨剑川沙溪寺登街繁荣的原因和弥沙盐井的开采对沙溪寺登街繁盛之重要影响等，彰显出文学院年轻教师的研究实力。

“作品分析与批评”板块中收录有8篇文章。李丹丹硕士的《爱恋、对抗到自我定位与自我消解——从〈边城〉看沈从文的人生理想》，通过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阐释了沈从文的人文理想和追求，并结合沈从文先生的生活经历，分析个中深层次的原因。作者的见解独到，显现出作者作为一位擅长做逆向思考的青年学者的活泼生动的语言个性；她的《大河与浪花——从〈青春三部曲〉看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通过对杨沫作品《青春三部曲》中林道静形象变化成长的分析，发现林道静走向革命后与工农革命的结合中，魅力已比前期逊色，并在比较了林道静与另一女主人公柳明的不同人生后，得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工农革命的社会中只有放弃知识分子“自我”的观点。文章不重复前人结论，不认同别人的观点，逻辑严密，较有见地。赵淑琴副教授的《从玉米的悲剧看中国人的官场意识——〈玉米〉中主人公形象的社会学分析》，对毕飞

字的中篇小说《玉米》中的主人公玉米复杂的性格和悲剧命运及其成因作了阐释,进而揭示出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场意识是造成玉米扭曲人格和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她的《从林白小说看女性意识的失落》一文,则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来解读林白独特的创作心理和个性,阐释她作品中强烈的女性意识及其特征,并揭示出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悲哀。文章眼界开阔,见解独到。邓家鲜副教授的《通向文学花园的路标——张爱玲小说的开头艺术浅谈》,对张爱玲小说的开头艺术作探究,阐述其作品的开头艺术的几种类型及其审美效用;《从诗意的追求到现实人生的叙述——浅论方方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一文,则对当代新写实派代表人物方方小说创作的两个阶段及其叙事特点作了思考,揭示方方在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从诗意的追求到现实人生的叙述的方法。王建华副教授的《再说夏洛克——人文主义理想的无奈呼声》,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人们众说不已的夏洛克,指出他并非仅仅是吝啬鬼,而是在那个时代无可奈何挣扎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形象,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看到了以反犹为代表的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的荒谬性,并通过这个形象表达人文主义理想的无奈呼声。李蕙与何世剑合作的《〈白象似的群山〉的叙事视角》对海明威的作品作了自己的解读。

“教学改革与实践”板块收录了14篇文章。那茂菊教授的《中外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一文,从未来教师的素质培养出发,对中外教育实习改革呈现出的综合化、多样化、一体化等趋势特点做了概括,并提出改革发展的应对措施。郭于海讲师的《方法·时机——谈指导实习生的两点体会》,则结合自己的实际谈了在指导实习中的一些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对初上讲台的实习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赵怀仁教授的《通过开设文学、绘画、音乐三位一体课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技能的研究》、马永春副教授的《高校大学生心理美育实效性探讨》、杨红斌副教授的《音乐听觉训练方法探索》,都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强调了进行美育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构想。尤其是赵怀仁教授的文章,论述了文学、绘画和音乐三者的内在联系和应用价值,并将音乐、绘画纳入文学的视野,论证了它们在提高思维能力、审美品位和胸襟境界上对学生素质培养的作用。张如梅副教授的《第二语言教学中的纠错》、年轻教师寸金燃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惯用语问题》,则从课堂教学的实际出发针对文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学习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留学生惯用语使用中的偏误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对汉语教学有较好的指导作用。杨云飞副教授的《柳永〈雨霖铃〉中“处”的特殊用法及语义》,周锦国副教授《从功能语法的角度看古代汉语被动句》,茅维讲师的《云南方言程度副词“非”的用法分析及其探源》,则是语言教学探索的成果。李守林副教授、黄滇君高级讲师、秦晋滇副教授、沈义淑讲师等,或对教学语言艺术、语文教学法作探讨,或对《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作思考,或针对学生应聘特点作阐述。

“理论探索与争鸣”板块收录了4篇文章。赵定甲教授的《意境和泛意境化倾向》一文,从意境和泛意境的概念和现状出发,提出意境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物我合一所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是诗化的宇宙意识和人生体验,是最具中国特色范畴的。但长

期以来对意境的解析众说纷纭，甚至把它变成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概念，把它等同于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等同于文学典型，等同于联想，等同于感情氛围，这是一种泛意境化的倾向，并指出泛意境化抽去了意境的精髓，实质上也就取消了意境。文章说理透彻，与作者对该问题的关注紧密相关。吴小光硕士的《老子自然观的人本主义思想发掘》，则从《老子》中老子提出的宇宙生成观所表现出对自然的偏爱出发，结合老子的哲学观念，阐述了老子蕴藏在其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论证合理、有力。李伯乾副教授的《我国的人口与教育分析》一文，从人口与教育的关系出发，论述了我国的人口状况对经济、素质教育的影响及对策。赵婉平讲师的《姜夔在南宋诗坛上的地位不应被忽视》则从姜夔的诗歌创作实际出发，分析论证了姜夔在南宋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文笔清新自然。

阅完文稿，秋色已暮。感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喜研心成著，群才奋起。欣以此文为序。

2007年10月24日于大理学院

目 录

·文化现象与解读·

纳张元：冲突与消解

- 逼近世纪末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 (1)

纳张元：生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吟

- 世纪末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 (13)

谭 璐：沈从文湘西小说与傩文化 (22)

赖桂香 谭 璐：“本我”的狂欢

- “80后”文学的心理蕴含解读 (27)

赖桂香 李 蕙：中国当代文学畅销书发展的现状及原因探析 (32)

·民族文化与研究·

何永福：九隆神话与图腾受孕机制 (37)

薛祖军：略论历史文化底蕴对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的影响 (43)

张锡梅：从白族的崇拜文化看白族的民族精神 (49)

杜成辉：大理国文学发展史述略 (54)

杜成辉：大理国诗人段福 (60)

朱安女：杜甫与南诏獠奴阿段 (65)

朱安女：“宋挥玉斧”之下的一个惨痛案例

- 大理国白氏碑与苏洵散文《张益州画像记》考释 (69)

贾雪仙：诗意居住的哲思与履践

- 李元阳的诗文创作与大理文化 (74)

胡晓燕：南诏铁柱及其文化初探 (79)

李晋昆：试论弥沙盐井的开采对沙溪寺登街繁盛之重要影响 (87)

赵 敏：大理“洋人街”的文化透视 (92)

饶峻姝：试论大理白族节庆旅游的开发与利用 (98)

·作品分析与批评·

李丹丹：爱恋、对抗到自我定位与自我消解 ——从《边城》看沈从文的人生理想	(103)
邓家鲜：通向文学花园的路标 ——张爱玲小说的开头艺术浅谈	(110)
赵淑琴：从玉米的悲剧看中国人的官场意识 ——《玉米》主人公形象的社会学分析	(115)
赵淑琴：从林白小说看女性意识的失落	(119)
邓家鲜：从诗意的追求到现实人生的叙述 ——浅论方方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	(124)
李丹丹：大河与浪花 ——从《青春三部曲》看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	(131)
王建华：再说夏洛克 ——人文主义理想的无奈呼声	(136)
李 蕙 何世剑：《白象似的群山》的叙事视角	(143)

·教学改革与实践·

那茂菊：中外教育实习改革的趋势	(147)
赵怀仁：通过开设文学、绘画、音乐三位一体课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技能的研究	(155)
马永春：高校大学生心理美育实效性探讨	(161)
杨红斌：音乐听觉训练方法探索	(166)
张如梅：第二语言教学中的纠错	(172)
寸金燃：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惯用语问题	(176)
周锦国：从功能语法的角度看古代汉语被动句	(182)
杨云飞：柳永《雨霖铃》中“处”的特殊用法及语义	(190)
茅 维：云南方言程度副词“非”的用法分析及其探源	(193)
李守林：教学语言艺术浅谈	(198)
郭于海：方法·时机 ——谈指导实习生的两点体会	(202)
秦晋真：对《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再认识	(207)
黄滇君：语文教学法浅议	(210)
沈义淑：应聘特点初探	(212)

·理论探索与争鸣·

赵定甲：意境和泛意境化倾向	(215)
赵婉平：姜夔在南宋诗坛上的地位不应被忽视	(219)
吴小光：老子自然观的人本主义思想发掘	(226)
李伯乾：我国的人口与教育分析	(231)
文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简介	(238)

文化现象与解读



纳张元 男，彝族，教授。迄今已有 200 多篇小说、散文在《十月》、《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坛》等刊物上相继面世，有 28 万字的文学作品专集《走出寓言》，该书 2006 年 6 月荣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成果奖”。小说、散文曾分别被《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和《散文选刊》转载。1999 年 5 月，复旦大学专门召开了“纳张元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思和教授亲自主持，《文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报道了这次作品研讨会的情况。研讨内容被《当代作家评论》2001 年 3 期以专栏形式隆重推出，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1 年 8 期全文复印。2006 年 8 月，被评为“云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现为云南省大理学院文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

冲突与消解

—— 逼近世纪末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

纳张元

翻开时下的少数民族小说作品，扑面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躁动感，那种难以平复的躁动情绪，流动在字里行间，潮起潮落，贯穿始终。当我反复阅读品味这些作品，并通过文字去寻找、触摸躁动的原因时，我发现：冲突以及试图对冲突进行消解的各种努力，正是引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作家们共同躁动不安的根本原因。

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完整的语言体系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加之居住环境的地域色彩和空间距离，使各民族长期以来从生存方式到文化

习俗，都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闭锁状态。在闭锁状态中按部就班的既定生活秩序和文化遗产方式，使各民族自成体系的生活静若止水，近乎永恒，这其实是一种沉睡式的生存状态，这使各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始终游离在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的边缘，甚至是边缘以外的地方。社会转型，国家经济秩序的调整和重建，主流文化意识的观念转变，对各少数民族既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近乎永恒古老平衡被打破，他们从沉睡状态中醒来，短暂的迷惘以后，就迅速对自我价值进行认定，并寻找自己的主体地位。寻找和自我认定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审视和自我估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边缘性”，无论地域、文化还是意识，都处在边缘的位置。躁动的情绪不甘处于边缘的位置，便决定向“中心”积极挺进。

城里的人想要冲出城外，城外的人又想冲进城。在这个冲进、冲出的过程中，碰撞和冲突在所难免。外来文化在冲击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遭到了民族民间文化的排斥和拒绝，各少数民族的“觉醒者”在向“中心”挺进的过程中同样遭遇到了种种不同的阻碍和挫折。各民族的作家们正是试图对这种碰撞与冲突进行形象化的描述和解释，并试图对碰撞与冲突进行理想化的消解。

一、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规范的冲突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旧的经济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经济秩序正在重建和尚待进一步完善，从新旧秩序的夹缝中向“中心”挺进的各少数民族的“觉醒者”们，无一例外地被置身于“义”和“利”的人生岔路口，这就是现代价值取向的谋利手段与传统道德规范的伦理观念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只要你踏上了其中的一条岔道，另一条路上的风景将永远与你无缘。面对这几乎是“二元对立”的选择，各少数民族的“觉醒者”们显得十分无助和迷惘。他们有的误入歧途，有的恪守道德，有的由道德取向而转向利益追求，也有的人永远徘徊在岔路口，不敢越雷池一步。回族作家马知遥的《南下广州》、苗族作家向本贵的《花落水流》、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的《手鼓》、维吾尔族作家胡勇的《聚会良宵》、回族作家查舜的《客居故乡》、纳西族作家沙蠡的《炸米花》、壮族作家黎国璞的《人在初春》、蒙古族作家庞友的《天显通宝》、苗族作家雪宇的《学堂屋》、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野马滩》、布依族作家卢有斌的《七月流火》等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动态地透视了面对新的经济秩序的反复冲击，各少数民族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的心理素质和伦理观念的嬗变过程。

马知遥的《南下广州》成功地塑造了亚瑟爷和马伏祥这两个代表性很强的形象。马伏祥代表了年轻一代回族青年面对市场经济所持的态度，在马伏祥的眼里，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物欲化的世界。商品社会不是“怪”就是“假”：“人日怪、房子日怪，规矩也日怪。”“要说好，那达钱好挣。钱的狂劲大！要说不好，归结起来就一个字——‘假’！”“人长得假，树绿得假，天蓝得假。”既然这个世界人人都在作假，他也就乘浑水摸鱼——假一回：将蒿子籽当作发菜籽贩往广州。马伏祥毕竟初出茅庐，良知未泯，传统道德的意识在他身上还没有被完全消解。因此，一边制假，一边却又有做了亏心事的

负罪感：“他觉得自己很卑鄙无耻！家乡的人，从甘草堡到马家庄都既忠厚又老实，一点也不狡诈，一种自惭形秽的心情使他想到活得很恶心，活得没球意思。心里凉凉的，那种疯狂的发财念头，一扫而光。”与马伏祥相对的是亚瑟爷，这是一个寓意很深的寓言式人物，他的身上沉淀了许多传统道德的因素，却绝不是道德的简单化身，他对马伏祥对金钱的疯狂迷恋十分忧虑，疑心他“中了邪，被依布利斯（魔鬼）缠上了。”所以，他教训他“你拴不住的驴一个！钱钱钱，要那么些钱作啥？够吃够喝就对哩。”但面对马伏祥嘲弄式的挖苦反击：“你说球得好听，你把你的金银财宝都拿出来！”他无言以对，并且身不由己地帮马伏祥制起假来。从亚瑟爷与马伏祥的关系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传统道德规范与反道德的行为在这里并没有发生正面冲突，而只是出现了一次道德错位或侧面碰撞。对于这种道德的错位，作家马知遥的消解方法令我非常意外：他让制假骗人的马伏祥同样被人骗，假发菜籽卖了十几万元假人民币，并被银行没收了10万元假币。这个近似戏剧性的结局，看似处理得有些简单，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并引起许多思考。

向本贵在《花落水流》中，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误入闹市，却迷失自我的人生走失者形象：刘金柱。他本来是想进城赚钱的，哪知道让这个城市把他给赚了。弄得他身无分文，走投无路，而城市却“连做乞丐的权力也不给”，他到处被人用棍子或拖把“赶牛吆猪”或“赶野狗一般”追来赶去，此时的城市在刘金柱眼里，“像一只血盆大口的猛兽，让他害怕，让他憎恨，他真想逃离这座城市，立即回到大刘寨去。”如果说穷得走投无路的刘金柱已经连做乞丐的权力都没有了，那么，此时的刘金柱还是刘金柱，他还头脑清醒、是非分明，他还清晰地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当他英雄救美，认识陈狗头以后，他就一步步迷失了自己。他明明知道陈狗头心狠手辣、男盗女娼，却仍然对他“从一个捡破烂的到现在的百万富翁”羡慕不已，并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打手，任由陈狗头驱使，为虎作伥。他明明知道陈狗头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玉叶和亚玲能够不顾廉耻委身于他，归根结底都是钱在作怪，“这个狗日的钱啊，硬是让鬼也推得磨啊。”却仍然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梦魇般身不由己，越陷越深，哪怕回了一趟大刘寨，也没能让他找回自己。反而一万元钱，就把自己最心爱的未婚妻枚香的贞洁给卖了。但他还执迷不悟，“狗日的陈跛子，你搞我的，我也搞搞你的看。”愚昧无知的古老心理平衡方法，可悲而又可叹。至此，刘金柱已经彻底地走失了自己，他最终“趴在地上，许久没有爬起来。”也就在所难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规范与反道德的谋利行为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和尖锐的冲突。

纳西族作家沙蠡的《炸米花》通过其克与米花匠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碰撞和冲突。全方位地透视了纳西族边远山区的人们自我封闭，容易满足，不思进取的懒散生活态度和闭锁文化心理。其克身上集中了纳西人热情仗义，坦荡无私的诸多优点，但也浸透了纳西人残存的许多劣根性：游手好闲，得过且过，生活无计划，没有长远眼光。家里没有灶，没有猪圈，甚至没有猪槽，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却还自得其乐。最致命的弱点是：“家乡宝”，没有冲闯意识，没有经济头脑，反而嘲笑人家浙江人“一辈子东奔西跑，

老死了，骨头回不到家乡……”米花匠起早贪黑，拼命挣钱，却生活十分节俭；其克吃不得苦，还总怀念“山里睡到日头过午没人管你”的日子，只要手中有两个钱，就大手大脚，花天酒地，肆意挥霍，两人一餐吃掉一百九十八元五角，还觉得极有面子，“像领金奖般兴奋，把那沓子钱拍在桌上，震得碗碗碟碟乱跳。”读到这个细节时，我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和“阿Q撒出满把是铜的和银”的潇洒形象，生活中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幕。由于对米花匠的“小气”和“无情寡义”的不满，更主要是不适应“不是人在的地方”的城市生活，其克又回到了玉龙山。但是，毕竟已经受过现代文明的启蒙熏陶，其克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他的心“有些怅怅的”，他“觉得不对劲。”“心里憋闷得很：过去一向温暖的石屋，猛可里变得古怪、阴冷、灰暗；熟悉可心的那几件家什也一下子变陌生了；特别是那猪粪和人汗混合的熏人味儿，不再像过去那样温湿宜人……”其克最终又离开了家乡，走出了玉龙山。从其克的身上，我们看到封闭的文化已被打破，闭锁的生存状态亦告崩溃，年轻一代人，再也关不住了，他们主动要求走出大山，走出闭锁的民族传统。

其它还有许多作品都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表现了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现代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冲突中的心灵震颤和艰难抉择。黎国璞的《人在初春》通过餐厅老板文仔与下岗女工田春芬的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择与冲突，让我们看到，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追求；庞友的《天显通宝》围绕一枚价值连城的“天显通宝”古钱币，朝鲁、斯琴和花子三人展开了一场爱与恨、灵与肉，正义与邪恶的争斗，情节扑朔迷离，人性的本质得到了清晰的透视；雪宇的《学堂屋》面对台商捐赠的30万元建校款，各色人等纷纷登台表演，把中国农民所固有的短视、愚昧、麻木自私等劣根性暴露无遗，再次让我们意识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千真万确；麦买提明·吾守尔的《手鼓》通过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四处上当受骗的经历，揭示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面对市场经济的无序状态，许多人的无所适从和茫然不知所措；查舜的《客居故乡》形象地告诉我们，商品社会使一部分人的良知和责任感也正在日益商品化；胡勇的《聚会良宵》抓住了当下人们的生存心态，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生活位置和社会角色的迷失。老同学聚会，各怀心事，众多的人，都有一种“看客”心理：人家的女人，人家的情人，人家的聚会，自己只是被邀请来的免费“看客”，看人家献花，看人家调情，看人家做戏，等到酒尽樽空，宴席散去，作为旁观者的“看客”就只剩下一怀愁绪和刻骨铭心的失落感、孤独感……

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无序和错位只是暂时的，从无序到有序，错位的都要归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进化发展的普遍规律。面对社会转型，小说中各色人等的迷惘和困惑，其实也就是作家们自身的困惑。但作家们仍然凭着直感，用理性的力量规范着社会人生的方式，对人生价值的取向进行着审慎的选择，所以马伏祥并没有“一骗几千万”，刘金柱也没有蜕化为第二个陈狗头，其克最终自己主动走出了大山，斯琴也最终在朝鲁的“一堆白骨前跪下”，文仔又请回了田春芬……作家们对碰撞和冲突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理想化消解，我们听到道德的手鼓仍在敲响。

二、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的冲突

中国的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深不可测而又扑朔迷离的猜不透的谜，它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虽然始终游离在主流文化边缘以外的地方沉浮，却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历经多少沧海桑田的变化和政治风雨的洗刷，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牢固的传统模式和精神气韵，具有惊人的超稳定性。它虽然始终处在边缘的位置。却不可避免地常常与主流文化发生碰撞和冲突，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抗着主流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侵蚀与消解。当主流或其他文化对它进行正面冲击时，冲击的力度越大，它的反弹力也就越强，常常欲速则不达；而当外来文化以隐性的方式进行渗透和侵蚀时，它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瓦解、改造，甚至重组。侗族作家隆振彪的《白牛》、满族作家晓洲的《草民》、满族作家那守第的《丁三老史和驴文化》、达斡尔族作家阿凤的《普通人家》、纳西族作家杨正文的《跛脚阿狗的婚事》、壮族作家黄佩华的《百年老人》、土家族作家龚爱民的《凭吊一盏灯》、瑶族作家唐克雷的《夜色温柔》、侗族作家余达忠的《自由落体》、壮族作家潘荣才的《守望家园》、彝族作家纳张元的《走出寓言》（载《十月》杂志1998年3期）、藏族作家三木才的《漂泊的部落》等，以不同的题材，从各个不同的独特角度，形象地描述了种种不同的文化碰撞过程，以及作家对文化碰撞与冲突的隐喻性消解。

隆振彪的《白牛》紧紧抓住了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古老，却又是最根本的图腾文化，来作为诠释文化碰撞的特殊道具。白寨侗人把白牛作为自己顶礼膜拜的图腾，原因模糊不清，几个传说语焉不详：有的说，白牛是天上白牛仙下凡帮助侗人耕地，而触犯天条，被打入凡间的；也有的说，白牛是白寨侗人的保护神，它曾救过白寨侗人的祖先；又有人说，白牛其实本来就是白寨侗人的祖先，是巫婆施妖术将她变成了白牛……就凭这众说纷纭模糊不清的原因，白牛居然成了白寨侗千年不变、万年不化的图腾：“白寨侗的话语是银子，千年不变色；白寨侗的誓言是金子，千年烧不化；白寨侗的规矩是大山，千年吹不动。”但葛天却敢于做“第一个触犯寨规的勒汉（后生）。”——杀牛！就因为他“读过初中”，“知道了许多白寨人不知道的事情，知道牛肉好吃而且能卖钱。”显然，葛天无视寨规，竟敢杀自家“六岁口的‘桐花白’”，这是他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结果，这是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的第一次交锋，现代文明来势太猛——一来就想杀死民族民间文化的内核：图腾。结果，在碰撞和冲突中，现代文明遭到了致命的反弹：葛天几乎被寨佬正木用寨规杀掉，亏了娜珠的死命相保，才侥幸拣回了小命，却被永远逐出白寨，连“魂魄都永远只许在外面流浪！”被放逐的葛天只好强忍屈辱，对寨佬正木反复哀求，这是现代文明对古老文化的一次妥协，葛天利用寨规“找替罪羊”的方式，躲过杀身之祸，回到白寨。但他并没有安分下来，“因为他懂得太多了，多得像地上的草。”他还是想破白寨的老规矩。“一切都该变一变了，先人的老规矩早就该扔到一边去了。”于是，他开始实施“借牛为名，买牛为实”的行动计划，这是对寨规的迂回渗透和侵蚀，也是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的第二次交锋，葛天巧妙利用了寨规中“借人东西损坏要赔”

的老规矩，争取到了反叛的合法性。“十里白”负下人命，葛天将它杀了。白寨侗人不仅没有为难他，还“第一次对寨佬的话产生了怀疑。”这是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的第三次交锋，现代文明利用古老文化的失误，迎头痛击，大获全胜。正木既是古老民间文化的顽固维护者，他自身又是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一头头白牛被赶出山外，他却无可奈何，“他的声音已失去了往日的震慑作用，白寨侗人已不再用惧怕的眼光望着他了”，他感到被大家“合伙抛弃”了，在“远古的声音”呼唤下，他离开了白寨，“他要去寻找部落生存的源头，去找回山林民族的魂灵……”小说从头到尾，正面展开了现代文明与古老民间文化的反复搏杀，作者选取了“图腾”这一特殊的传统文化内核作为道具，在表现和诠释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黄佩华的《百年老人》中农宝田是一个蕴涵丰富的人物形象，他“一生中直接或间接繁衍了49个子孙。”这些儿孙出外四处谋生，一个个外出的儿孙，都是农宝田放飞的一个个希望。年关逼近，100岁高龄的农宝田用40倍的望远镜充当了一个耐心的守望者角色，他在守望那些放飞的希望，更是在守望一个百岁老人的最后心愿：四世同堂。他没有守到自己的儿孙，却等来了一对北京的男女大学生。这对青春勃发的年轻人的喧腾，使早已过了激动年龄的农宝田“逐渐变得燥热”，并躁动起来，由此展开了他怀旧的一生。百岁老人农宝田是特殊民间文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他不保守（相反，很开放），也不狭隘（相反，很宽容），明显是衰老钝化的民间文化的化身。他也曾经年轻过，并且充满活力，充满传奇性。但现在，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他衰老了，萎缩了，钝化了，生活中的幸福，只剩下遗传的幸福，儿孙满堂，传宗接代，既是农宝田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一种途径，也是民间文化失去活力以后的最后选择，农宝田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但是，一对青年男女的到来，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激情，他开始不满足于仅做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的活祖宗，而不断怀旧，怀想他的青春，怀想他的爱情，怀想他充满传奇性经历的一生。这其实是衰老钝化的民间文化试图恢复活力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显然是枉费心机，“农宝田经过这番折腾，神情比原先憔悴多了。目光变得呆滞、木讷，嘴巴微张开着，嘴角的涎水不断下滴，双手不时毫无目的地晃动，”衰老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法则，文化领域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农宝田临死前的一句交待：“要给老七娶个女人，生几个仔。”传宗接代，既是民间自我价值认定的一种方式，也是民间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许，在中国的民间，生活的幸福太少了，遗传的幸福才显得如此强烈。农宝田“那只跳了100个年岁的心脏急速地鼓跳了一阵，便停息了。”衰老钝化的民间文化终于极不情愿地退场了。

龚爱民的《凭吊一盏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充满隐喻性的故事。一盏油腻的灯，引着龙老三走入李芹的生活，打破了她的宁静，并改变了她的一生。小家碧玉的李芹，初遇“水上浪荡十五年”的龙老三，虽心存疑虑：“老三像个鬼影”。但更多的是好奇和喜悦，就连龙老三的脚步声，她也听得“十分悦耳。”但是龙老三是有家室的人，很快